

种族关系的隐晦书写

——玛丽莲·罗宾逊《基列家书》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杜光慧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玛丽莲·罗宾逊的《基列家书》以家族史透视美国种族关系发展的历史, 并以自身对种族歧视的抨击对现实进行重塑, 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互动。“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是新历史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 以此为基点: 一方面, 《基列家书》完成了对美国种族问题的隐晦书写, 间接折射出黑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生存困境; 另一方面, 《基列家书》寄托了罗宾逊对美国种族平等的期望, 以此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能动地参与历史的构建。

关键词: 《基列家书》; 新历史主义; 历史的文本性; 文本的历史性; 种族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4)03-0240-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20918451

Implicit Writing of Race Relations

—Marilynne Robinson's *Gile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DU Guanghu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depiction of family history and attack on racial discrimination, Marilynne Robinson's *Gilead* reveals the history of race relations and reshapes re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the novel *Gilead* realizes interaction between text and history, embodying New Historicism's two basic concepts: "Textuality of history" and "Historicity of text". On the one hand, *Gilead* completes the implicit writing on racial issue of America, suggesting the plight of blacks in history and reality. On the other hand, *Gilead* expresses Robinson's aspirations for racial equality in America, which ca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as a part of it.

Keywords: *Gilead*; new historicism; textuality of history; historicity of text; race

玛丽莲·罗宾逊 (Marilynne Robinson) 是美国当代文学中备受瞩目的女作家。她关注边缘人物的生活, 将老人、妇女、儿童作为创作的核心, 富有人文关怀精神。罗宾逊 2004 年出版的《基列家书》以一位患有心脏病的老牧师埃姆斯为叙述者。年逾古稀之际, 老牧师以虔诚平静的口吻向 7 岁的儿子

罗比娓娓道来自己的一生, 希望儿子长大后能通过这本家书来了解自己。然而, 《基列家书》作为罗宾逊基列系列小说中的第一部, 不仅是一位行将就木的老牧师对年幼儿子的殷殷嘱托, 还通过个体的讲述, 再现了牧师家庭之外的基列小镇乃至美国近代种族关系发展的历史。

收稿日期: 2022-09-18

作者简介: 杜光慧, 女,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现当代英美文学。E-mail: veronicadu2021@163.com

《基列家书》出版次年即获普利策小说奖，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劳拉·坦纳（Laura E. Tanner）认为《基列家书》中的文化力量，“不仅源于它对日常经验的抒情描绘，还在于它有力地揭示了死亡是如何塑造人类知觉的感官和心理动态的”^[1]。针对这一观点，刘建华指出，坦纳所说的“日常经验”所指不清，也丝毫未提这种日常经验是否包括有关种族关系的经验，而种族关系是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2]。美国轰轰烈烈的内战、废奴运动、民权运动和种族隔离等事件都潜藏在这封家书平淡的叙述之下，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如苏珊·佩蒂特（Susan Petit）所言，罗宾逊非常“隐晦”^[3]地刻画了美国的种族主义，这种“隐晦”体现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出现黑人角色，全篇都由一位白人牧师来叙述，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场的黑人诉说自己的苦难，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正是罗宾逊作为一名白人作家与理查德·赖特和托尼·莫里森等黑人作家创作的区别。然而，采取隐晦的书写方式并不代表罗宾逊刻意回避美国种族问题的历史^①，黑人在《基列家书》中的沉默和缺席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在场”^[4]。并且，罗宾逊对种族关系的隐性书写恰恰呼应了莫里森在题为《不可言说的不能言说》的演讲中的发言：“有一些缺席是被如此地再三强调，如此地精心布局，如此地周密安排，以至于这些缺席本身呼唤着人们的关注，吸引我们去探索其意图和目的。”^[5]这种隐晦的书写策略实际上反讽般地唤起了读者对小说中种族问题的关注，启发读者思考当下的种族关系。此外，“基列”（Gilead）作为这本书的标题含义丰富。在书中，基列是美国中西部爱荷华州一个虚构的小镇；在圣经里，基列是生产乳香的疗伤之所。内战前，北美黑人有一首广为传唱的灵歌^②，“基列有乳香”（There Is a Balm in Gilead），这首灵歌表达了美国黑人借基列的乳香来疗愈自身创伤的愿望以及他们对种族平等的热切渴望。如上所述，罗宾逊以小见大，以隐晦的叙述方式和隐喻性的标题来暗指美国的种族问题，在家族史中融入了美国种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体现了她对于历史和边缘人物的关注，这与新历史主义关注小写历史、重视边缘话语的观点不谋而合。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打破了文学和历史之间的界限，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动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历史主义以反叛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的姿态在文学理论的众声喧哗中诞生。一方面，新历史主义跳出了以新批评为主

导的文学的文本细读和内部研究，转而将文学文本放回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向在艺术生产和其他社会生产之间做截然划分的假设挑战”^[6]670-671；另一方面，新历史主义反对旧历史主义的客观历史观，拒绝旧历史主义把历史当作文学背景的做法，主张重新唤起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是对后结构主义的非历史倾向的反击”^[7]3-4。总之，新历史主义者对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一视同仁，强调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在他们看来，文学和历史并不是简单的“前景”和“背景”的关系，“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8]92。“历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 of history）和“文本的历史性”（historicity of texts）因而成为新历史主义的两个基本特征。本文以此为基点，结合新历史主义的其他概念，分析《基列家书》完成了对美国种族问题的隐晦书写，间接折射出黑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生存困境；同时，《基列家书》寄托了罗宾逊对美国种族平等的期望，并以此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能动地参与历史的构建。

一、历史的文本再现

“历史的文本性”是路易斯·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在《宣称文艺复兴：文化的诗学和政治》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由于我们无法亲自体验完整而真实的过去，所以必须依靠残存的文本来了解历史；另一方面，当这些文本被历史学家转化成“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时，它们本身将再次充当文本阐释的媒介^[9]。换言之，历史其实都是文本化了的历史，是经由历史学家撰写以文本的形态呈现出来的，这一书写过程必然裹挟着历史学家个人的偏见并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历史并不是完全客观的。正如詹姆逊所言：“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

①在《从“挪亚的诅咒”到美国非洲主义——对鲁宾逊种族书写的反思》一文中，唐莹认为鲁宾逊的种族书写暴露出了白人作家写作的两面性，即一方面积极对抗种族歧视，另一方面又回避历史问题和不公现实。本文认为罗宾逊对种族关系的隐性书写恰恰源自于她对种族问题的重视与强调，并没有刻意回避。

②灵歌是北美黑人的宗教礼拜歌曲，内容大多反映黑人遭受残酷奴役的痛苦。

才能接近历史。”^[10]历史成为了一种文本,与文学之间的界墙轰然倒塌,它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不再是历史学家所谓客观的单一宏大叙事,而是一种多元的阐释。“一个叙事性陈述可能将一组事件再现为具有史诗或悲剧的形式和意义,而另一个陈述则可能将同一组事件——以相同的合理性,也不违反任何事实记载地——再现为闹剧。”^[11]历史学家的个人偏见使得他们所书写的文献本身即是拼贴和加工的产物,历史文本也因此像文学文本一样带有虚构色彩。新历史主义者正是在历史的客观性被瓦解的情况下去触摸真实,他们把过去所谓单线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小写的历史(histories),以此来对抗官方的宏大叙事。与迎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旧历史主义不同,新历史主义者通过将目光转向以往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小写历史来对历史进行重构,从而达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

罗宾逊曾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做任何事情的一定之规就是阅读能找到的最原始、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材料。”^[12]她尽力寻找被边缘化的那一抹真实,捡拾被遗忘的历史碎片,这与新历史主义重视小写历史的思想一脉相承。她以杰克在基列这一白人小镇的遭遇来反映基列小镇对黑人日益盛行的保守主义倾向,将黑人被迫迁移的历史融入到文本的书写中,这一情节设置充分体现了“历史的文本性”这一特征。在基列,杰克是老牧师鲍顿最亲爱的儿子,也是叙述者埃姆斯的教子。小时候的杰克热衷于恶作剧,偷窃成性并以此为乐。长大后,他浪子回头,再次回到基列小镇,希望能给自己的黑人妻子和儿子寻得一方安身之地。基列小镇并没有反对种族通婚的法律,按照法律规定黑人可以在此谋生。然而,他并没有预料到基列小镇现在已无黑人居住,并且小镇居民对待黑人的态度愈发保守,对黑人的遭遇也极为冷漠。曾经的爱荷华州被总统格兰特将军誉为“激进主义灿烂的明星”,可现在勇当废奴先锋、积极参与废奴的历史已渐渐被小镇居民遗忘,基列小镇愈发保守,留下的只是“尘土和灰”^[13]¹⁹⁰。面对残酷的现实,杰克只能再次选择离开。在全是白人的基列小镇,杰克是不受欢迎的边缘人物;在妻子黛拉的家乡——禁止跨种族通婚的黑人聚集城市孟菲斯,杰克更是一个被排斥的局外人。更糟糕的是,由于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杰克无法为黛拉和孩子提供正常的生活,居无定所,有时还必须靠黛拉家人的接济生存。杰克在白人社区和黑人城市所受到的冷漠使得他成为象征意义上的黑人,他的

被迫离开既是对美国白人种族歧视的讽刺,也间接再现和凸显了黑人的生存困境和边缘地位。

罗宾逊不仅以隐晦的书写策略表达自己对非裔美国人的关注,她还通过设置祖父带埃姆斯去看棒球赛这一情节将黑人球员遭到白人排斥的历史蕴含在埃姆斯云淡风轻的叙述中。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厚描”概念出发,以期挖掘出棒球比赛背后的文化内涵。“厚描”最初源于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赖尔在《对思想之思考》中形象地区分了两个男孩的“眨眼”和“挤眼”行为。从外在的动作来看,二者都是一模一样的生理性的眨眼,但第二个男孩的眨眼是为了给朋友传递某种信号,属于文化范畴,因而成了有意地“挤眼”。针对赖尔的区分,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如果采用“薄描”的方法,即摄像机式客观地记录外在的眨眼行为,是无法区分出生理性的“眨眼”和带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挤眼”的。格尔茨从自己记录的田野日志出发,提出采用“厚描”的方法阐释他族文化,即“从极简单的动作或话语入手,追寻它所隐含的无限社会内容,揭示其多层内涵,进而展示文化符号意义结构的复杂的社会基础和含义”^[14]。可以看出,文化研究里的厚描致力于对文化符号的清晰描述,只有了解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阐释出文化符号的真实含义。在具体实践中,格尔茨的厚描即为重视“在任何一种文化实践中都会出现的看上去无足轻重的细节”^[15],通过挖掘这些细节在文化语境下的深层意义,从而更好地阐释他族文化。新历史主义者格林布拉特借用了格尔茨文化人类学的厚描方法,将文本视为压缩了的文化,提出在文学中要深入考察文本细节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让文学与非文学成为彼此的厚描”^[16],从而更好地触摸真实。

棒球是一个出现在《基列家书》许多场景中若明若暗的文本细节。从表面来看,棒球是埃姆斯牧师的爱好,他在收音机里“听过几千次棒球比赛的实况转播”^[13]¹⁴⁶,在头脑中想象棒球比赛的场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此外,棒球还是埃姆斯和兄长爱德华之间的调和剂,一起打棒球的经历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加深了感情。然而,棒球不仅仅是一项爱好和运动,作为美国的国球,它还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棒球这一美国文化的象征性符号进行厚描,即将棒球放置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考察其含义,有助于理解罗宾逊对于美国种族歧视现象的揭露和批判。

《基列家书》中埃姆斯和祖父一起看棒球赛的经历反映出美国棒球界存在的种族主义。在埃姆斯约10岁时，致力于废奴事业的祖父带他去得梅因看巴德·福勒的棒球比赛，并且声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巴德·福勒”。可在埃姆斯的回忆里，那场比赛并不像祖父期待中的那么精彩，“没有跑垒得分，没有安打，没有失误”，甚至因为暴雨而中止，祖父最终“大失所望”^{[13]48}。对于小时候的埃姆斯来说，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他不明白比赛中止背后隐含的文化含义。而对于支持种族平等的祖父来说，福勒作为黑人运动员能和白人运动员同台竞技是种族平等的重要象征，他对黑人球员福勒的支持也是对种族平等事业的支持。遗憾的是，福勒在比赛中并不出色的表现以及比赛的被迫中止都让祖父的一腔热情付诸东流。事实上，福勒后来的棒球事业也困难重重。1876年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实施之后，黑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种族隔离的限制，棒球领域也不例外。白人运动员对黑人运动员的敌意和排挤使得国际联盟在1887年正式禁止签署非裔美国人球员，黑人棒球运动员渐渐在大众的视线里销声匿迹。因此，在深入考察棒球的文化含义后，棒球作为美国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同时呈现出两方面的文化属性。一方面，棒球比赛加强了美国白人运动员之间的凝聚力，巩固了白人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棒球比赛又将黑人球员排斥在赛场之外。在对棒球这一文化符号进行厚描后，美国种族隔离时黑人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历史跃然纸上。

二、文本再现的历史意义

与“历史的文本性”相对，“文本的历史性”指的是“所有的书写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而且包括人们处身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具体性，镶嵌着社会的物质的内容”^{[6]673}。具体而言，文本的历史性有两层含义。首先，文本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符号，其背后承载着社会文化网络。文本具有文化性，它并不是断裂式地横空出世，而是特定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和阶级地位的产物，因此意义自语境中产生。在阐释过程中，新历史主义者关注“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本文中的社会存在”^{[7]5}，主张不应像形式主义那样孤立地困于语言的牢笼，而应同

时关注作者写作的语境、读者接受的语境和批评的语境。此外，新历史主义者将文本视为历史中发生的一个“事件”，文本不仅是历史的反映，还将持续发挥影响力，能动地参与社会 and 历史的塑造。不同时代的历史语境导致读者对文本有不同的解读，这也决定了文本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读者、文本和社会文本之间的对话共同建构了历史。

文本的历史性表明作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因此，研究作者思想和作品产生的文化背景对于作品的阐释具有重要意义。罗宾逊的创作根植于美国的社会历史环境。自建国起，《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就将黑人排除在外，黑人在奴隶主的眼中是可以随意奴役和迫害的工具。美国内战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这只是虚有其表，非裔美国人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种族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导致黑人在生活中遭受着种族隔离。他们被迫在学校、教堂、商店、医院等公共场所分隔开，无法享受同等的教育、就业等权利，沦为被全方位边缘化的二等公民。虽然长期的压迫催生了20世纪50、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黑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有明显的改善，社会生活领域的种族歧视现象有所减弱，但21世纪美国的种族歧视现象并没有消失，只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潜藏在各个领域，种族关系日趋紧张，普遍性的种族歧视愈演愈烈。可见，美国的种族歧视现象贯穿其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罗宾逊深知铭记历史和重写历史对改善当下种族环境的重要性，她认为“那些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剥夺了自己从历史中学习的希望”^[3]，她的创作展现了以往被边缘化的非裔美国人的小写历史，对于改善当下的种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文本的历史性意味着文学也是权力运作的产物。新历史主义者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汲取思想来源，指出权力以话语的方式“散漫地存在于意识形态的意义系统、特定的表述方式、反复使用的叙述结构之中”^{[6]678}。文学文本不可避免地成为话语争夺和权力斗争的场所，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得到了强调。因此，作家们执起笔杆，不仅以书写来反抗和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还在文本中隐寓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理想追求。罗宾逊于2004年发表《基列家书》，她将美国种族关系的变迁融入到自己的写作中，以反思性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于后民权时代种族歧视现象的不满。她通过塑造埃姆斯的祖父这一热情的废奴主义者形象，号召白人重新思考种族议题，鼓

励当下的美国人践行种族平等。小说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埃姆斯对其祖父的回忆。祖父出生在缅因州,内战前他只身前往堪萨斯州帮助“自由土壤党人”^③争取选举权。根据“密苏里妥协案”,堪萨斯州位于北纬36度30分以北,应该发展为自由州。然而,南方的奴隶主却无视法案,蛮横地用武力企图将堪萨斯州发展为蓄奴州,从而激起了北方人民的愤怒。此时,国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规定堪萨斯州成为蓄奴州还是自由州应该由堪萨斯州的居民投票决定。于是,许多北方移民在号召下迅速奔往堪萨斯,为堪萨斯州摆脱奴隶制的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埃姆斯的祖父即是移民中的一员,他坚决反对奴隶制,并结识了北方移民反奴隶制武装力量的领袖约翰·布朗,和士兵们一起奔赴战火纷飞的前线,甚至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作为一个牧师,祖父在教堂讲道,鼓励年轻人参军打仗;他还救济穷人,经常把家里的东西送给别人,帮助生活困难的退役士兵和寡妇申请救助金。最终,广大人民在约翰·布朗的带领下取得了堪萨斯内战的胜利。祖父勇于反抗奴隶制的精神和将其付诸实践的努力值得当下美国人学习。透过祖父这一积极的废奴主义者形象,罗宾逊意在提醒当下的美国人铭记过去,铭记历史,用实际行动反对种族主义。

除了祖父,罗宾逊还塑造了带有隐含种族主义观念的老牧师埃姆斯这一人物,意在呼吁当下的美国人反思自己的种族立场,摒弃种族歧视,践行种族平等。《基列家书》的白人叙述者老牧师埃姆斯是小镇的精神导师,然而,在对待教子杰克和他的黑人妻子这一问题上老牧师却暴露出内心隐蔽的种族主义立场。当主张人人生来平等的埃姆斯看到杰克和其黑人妻子的照片时,内心“吃了一惊”^{[13]232};当杰克询问埃姆斯他和黑人妻子是否可以在基列一起生活时,一向口若悬河的埃姆斯牧师却不知如何回答;在杰克向埃姆斯提起黑人教堂失火事件时,埃姆斯只是冷冰冰地回应“只是一场损失不大的小火”^{[13]248},毫不关心黑人的安危和起火的原因。他对黑人态度的冷漠与其祖父为争取种族平等的热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部分美国种族观念的变迁。埃姆斯牧师作为小镇居民的精神导师,是较有影响力的人物,连他都无法身体力行地践行种族平等,何谈基列小镇其他居民。和杰克的谈话使埃姆斯意识到自身褊狭的种族主义观念,经过内心的审视和挣扎,埃姆斯最终理解了杰克并

为他祝福。他感慨道:“忙忙碌碌这么多年,似乎就是为了这一刻。”^{[13]259}埃姆斯牧师终于调和了信仰和实践之间的冲突,他在给予杰克救赎与安慰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的心灵救赎。种族偏见不止存在于历史中,小说创作的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已不似从前那么如火如荼。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保守主义政策导致种族主义势力抬头,种族关系愈发紧张。虽然5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对于黑人的歧视在法律层面基本解除,但在实际生活中,黑人在教育、就业、医疗方面还是无法与白人完全平等。通过塑造老牧师埃姆斯这个人物,罗宾逊以一己之力呼吁广大白人反思自我,希望他们能关注受压迫的黑人的历史和生存困境,而不是选择性地忽视黑人的存在。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等其他非文学文本是相互塑造的关系。文学并不只是被动地反映历史,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互文关系意味着文学文本也将能动地参与历史的构建。《基列家书》不仅为读者了解美国的种族关系提供了一扇窗口,还作为历史的一部分积极地参与现时历史的塑造,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互动。小说出版不久后即获普利策奖,收获了一大批读者,奥巴马总统也是其中的一员。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人总统,他的当选使很多非裔美国人看到了种族平等的希望。他在总统竞选期间经常翻阅这本书,甚至在2015年对作者罗宾逊进行了一次访谈。他的采访和推荐使更多的人了解《基列家书》,了解美国种族问题的历史。直到今天,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还没有消逝,美国也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后种族时代”,《基列家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呼唤人们像老牧师埃姆斯那样反思自身的偏见,更要像祖父那样为种族平等付出实际行动。《基列家书》展现了罗宾逊对于种族问题的重视,它将持续发挥影响力,“作为塑造思想的活跃力量而参与历史的发展进程,对现实世界的人们进行思想的改造与塑造”^[8]。

三、结语

新历史主义重申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是对形

③自由土壤党是1848至1954年间反对奴隶制的美国政党,提出“自由土壤,自由言论,自由劳动,自由人民”的政治口号。

式主义和新批评的反拨。《基列家书》是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产物，以隐晦的书写方式再现了被边缘化的非裔美国人的悲惨遭遇，重构文化历史语境。基列小镇虽为虚构，但它又是美国中西部无数个小镇的真实写照，文学与历史、虚构与真实的互相交织颠覆了白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然而，在谈到新历史主义批评时，有学者指出：“边缘与中心处在‘二元对立’之中，一味坚守边缘则易造成僵化，而且会使边缘成为新的中心的主流，从而使抵抗变成投降，颠覆转为顺从，并导致文学新颖性和独创性的丧失。”^[17]而玛丽莲·罗宾逊作为一个白人作家，并没有大张旗鼓地一味强调边缘，而是采取隐晦的书写策略，在自己的身份和创作意图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从而规避了像新历史主义一样可能陷入二元对立的危险。

参考文献：

- [1] TANNER L E. “Looking back from the grave”: sensory perception and the anticipation of absence in Marilynne Robinson’s *Gilead*[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07, 48 (2): 227–252.
- [2] 刘建华. 玛丽琳·鲁宾逊小说的文化力量[J]. *国外文学*, 2014 (1): 130–137.
- [3] PETIT S. Field of deferred dreams: baseball and historical amnesia in Marilynne Robinson’s *Gilead* and *Home*[J]. *MELUS*, 2012, 37 (4): 119–137.
- [4] 汪小萍. 可见的隐形：《基列家书》与《家园》对肤色盲论的讽喻[J]. *外国文学评论*, 2022 (1): 105–122.
- [5] MORRISON T. 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 the Afro-American presen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J].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1989, 28 (1): 1–34.
- [6] 赵一凡, 张中载, 李德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7]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8] 胡作友. 在史实与文学之间穿行——解读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9 (1): 89–94.
- [9] VEESER H A. The New Historicism[M].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 [10]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M]. 王逢振, 陈永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1] 海登·怀特.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 陈永国, 张万娟,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2]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M]. 肖海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 [13] 玛丽莲·罗宾逊. 基列家书[M]. 李尧,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 [14] 张进, 仲红卫.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人类学[J]. *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25(4): 73–79.
- [15] 段峰. 深度描写、新历史主义及深度翻译——文化人类学视阈中的翻译研究[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 90–93.
- [16] 陈怀凯.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的“触摸真实”[J]. *国外文学*, 2020 (2): 1–9.
- [17] 张进.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J]. *文史哲*, 2001 (5): 26–32.

(责编：朱渭波)